

汪精衛的悲劇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倘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這是古人評論人物，重視晚節的感詠。所謂「蓋棺論定」；一生的善惡是非，最重要的是最後的事實表現。

汪精衛有瀟灑的儀態，雄辯的口才，犀利的文筆，謙和的風度。胡漢民談起汪的演說，曾表示：「出詞氣動容貌，聽者任其操縱，余廿年未見人演說過於精衛者」。而接待應對，處處都能表現他的親切與誠摯，祇要半小時的閒談，就能博得來人對他的好感。即使對他不滿的人，祇要與他晤談一次，往往會化除成見，對他油然而敬；他確有吸引人的天才與魔力。他的文筆，不但在與「保皇黨」論戰時發露鋒芒；而且當他因為行刺滿清的攝政王未遂被捕後，竟然以一篇洋洋灑灑的親供辭，使主持審辦的肅王，有憐才之意。而其：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的詩句，更是錚鏘雄壯，膾炙人口。假使當年他真的「引刀成一快」，以他的才華、事蹟，不但將成為中華歷史上的節烈之士，留下光榮的一頁；而且一定會使人悼惜，懷念不已，成為歌誦的好對象。

可是，當抗日戰爭最緊要的關頭，他却在上一心、全面奮戰的情勢之下，以身爲中國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國民參政會議議長之尊，潛逃國外，與日敵勾搭，組織僞政權，背叛國家。

「奈何佳人竟作賊」？

以「引刀成一快」開始，而轟動全國，留芳一時；最後竟然以漢奸首逆，客死敵國，遺臭萬年，真是不可思議。何以至此？從下述他一生的經過中，自可得到答案，而且最值得後人引爲警惕！

革命志士·長厚美名

汪精衛的祖籍，本是浙江紹興，因爲他父親省齋（名琚）于咸同之交，避太平軍之亂，由海道去廣州，在官府中做師爺；並且娶了當地的盧氏爲妻，於是定居廣州。盧氏生子名兆鏞後，病死。省齋再納吳氏爲妾，生三子，精衛最幼，名兆銘，號季新，字癸辛。

省齋生活雖不寬裕，但却重視「書香門第」，兆銘從五歲開始，即入塾讀書。十四歲父母雙亡後，在長兄兆鏞督責嚴酷之下，奠定他國學的基礎，居然十七歲就當了塾師，十九歲中了秀才。廿一歲（一九〇三年）考取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官費生，東渡留學，一年半畢業，自費升入法政大學專科。

一九〇五年七月，國父赴日本，與黃興、宋教仁等合作，組織同盟會（中華革命同盟會）；汪兆銘參加了組織，被推選爲評議部的議長，（議員爲胡漢民、馮自由、朱執信；另執行部長黃興、司法部長宋

教仁）成爲黨的重要幹部。是年十一月廿六日，同盟會出刊「民報」，鼓吹革命，並與當時尙頗具聲勢的「保皇黨」論戰；汪與胡漢民、廖仲愷、陳天華，都担任撰述；汪始以精衛爲筆名而行諸當世。

根據胡漢民的回憶，當時汪精衛係就革命與立憲的關係、中國民族的立場、何以必需革命等要點，多所闡發，反駁梁任公「保皇」主張；胡漢民與朱執信等，則解釋三民主義的時代需要，斥責梁任公祇代表新官僚的利益，而不知有民衆利益。結果，「民報」全勝，「保皇黨」的「新民叢報」被迫停刊，「保皇黨」也就在日本銷聲匿跡了。剛剛廿三歲的汪精衛鋒頭之健，可想而知了。清廷見革命黨聲勢日大，請求日本政府取締，於是「民報」被迫停刊，陳天華自殺，汪與胡漢民隨國父赴河內。

一九〇七年黃岡之役，余紀成起義成功，光復黃岡城。負責指揮的許雪秋，在香港和胡漢民接洽，承擔轉運軍械接濟黨軍的任務。可是當黨由日本密運槍械千桿抵達汕尾，等候下貨接駁時，許却毫無準備；運械船隻停留三天，許仍徬徨無措，適清兵艦隻駛來，該商船惟恐出事，乃駛往香港口岸。黃岡黨軍久候新械不至，再遭清軍反擊，遂告失敗。許自己無能債事，却往河內見國父與汪精衛，把全部責任推卸到胡漢民身上。汪去電詰胡，胡見許如此虛誑無恥，殊爲憤憤，乃將經過詳情函告汪精衛，且謂：「余向來作事，不願尋常千萬人之誣謗，惟憂二三知我者之不諒。許不足道，兄乃見疑，實非所料。」

汪受責難之餘，却能懇切的對胡加以忠告；於是復書有云：「同時已得各種報告，知許言皆誣，前亦非有所疑，特欲急得來書，以斥其謬耳。弟知人之明，素不如兄；故同志謂兄精明，而弟長厚。弟不願以

加坡創辦「中興日報」，繼續鼓吹革命。後來，國父往歐洲，命胡返香港，密與黃興、趙聲、倪映典等謀廣州起義事，汪則前往日本東京。

汪精衛自河口失敗後，即有行荆鄂攝政之事的決心，胡屢加規勸，不聽。赴東京後，胡再長函勸阻，力言暗殺無濟，應當致力於整個革命事業。汪不爲所動，也報胡以長函，略謂：

「生平察事，自信不如兄；惟此事則如旋螺，弟已計劃到最末之點，更無疑義。兄主張軍事行動，無大款何以能舉，海外奔走，爲效甚微；不有劇烈舉動，何以振起人心，弟又不長於軍事，既決心犧牲，只有惟所自擇」。

一九〇九年，汪在日本與黃復生、喻紀雲、曾醒、方君瑛、黎仲實、陳璧君（汪與陳的結識姻緣詳後章）等組織暗殺團體試驗炸彈，被日本警察驅逐出境。十一月，潛赴北平，準備行刺攝政王。後來一度返香港，祕密製造炸彈，再度北上前，留書國父告別：

「欲維持團體，原在努力於事實之進行，則灰心者復歸於熱，懷疑者復歸於信」又作書告別南洋諸同志，略謂：

「今者將赴北京，此行無論事之成否，皆必無生還之望，故預爲此函托友人漢民代存，事發後卽爲代寄。……弟將爲此事，生平師友知而責之，以爲死之易，不若生之難。願以革命之事，當就其性之所近者，擇一而致力焉。……死者已矣，生者因將來革命之風潮日高，而其所負之責任日重，其勞瘁苦況，必有

十倍於今日者，弟不敏，先諸同志而死，不獲共嘗將來之艱難，誠愧惡。弟雖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

激昂慷慨，意氣干雲；當時的汪精衛真不愧為革命的傑出志士。

行刺攝政王·義無反顧

一九一〇年，汪精衛在北平順治門外大街江西會館附近，開設「守真照相館」為掩護機關，又在東南園租一小四合院，製造炸藥。因為裝炸藥的鐵罐太小，乃根據陳璧君建議，在驟馬市大街鴻太永鋼鐵號家鑄一隻能裝五十磅重的大鐵罐，送到「守真照相館」備用。

汪查勘十刹海旁的甘水橋，是攝政王每日進宮出入必經之地；於是，由黃復生、喻紀雲二人潛往橋下掘坑埋炸彈。因為犬吠，驚動民政部偵探，事遂敗露；因為鐵罐上鑄有鴻太鋼鐵號字樣，查到「守真照相館」，捕去黃復生、羅世勛；再到東南園，逮捕汪精衛，剛巧陳璧君等不在，未被牽涉。

汪被捕後，抱必死決心，曾賦詩四首以明志曰：

「御石成癡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蓋逐海鷗浮。」

「姹紫嫣紅色，從知煊染難；他時好花發，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赴劫友；青燐光不滅，夜夜照高台」。

此案當時震驚朝野，清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親自提訊。汪素筆親寫供狀，伏地疾書，洋洋灑灑，一揮而就。善耆親自取閱，見其字跡娟秀，文筆通暢，所言政治問題，識見遠大；對預防國際瓜分之禍，尤為痛切，竟動了憐才之念。遂不同意法部尚書紹昌：「大逆不道，應立即處斬」之議；認為是未遂罪，請旨改為永遠監禁。並且關照監中，給汪比較寬和的待遇。

在香港的革命同志，得此噩耗，起初以為「精衛必死」。黃興、趙聲、胡漢民等均流涕太息，而胡尤痛切，趙聲慰胡曰：

「精衛已殺身成仁矣，是舉聞於天下人，且將有長厚者亦復爲之之感。是死一精衛，更將有百十精衛爲繼起，何苦戚戚如是？」

古云：「死有重於泰山」，如汪精衛當時真的成仁，不但得到死所，而且可以不朽了。可是，回峯路轉，一年以後，武昌起義，旬日之間，東南各省相繼獨立。資政院議員易宗夔、直隸省諮議局議員孫洪伊，先後提請政府釋放政治犯，解除黨禁；兩廣總督張鳴岐，也專電奏請開釋汪兆銘等人。民國前一年九月十六日，清法部奉上諭：「汪兆銘、黃復生均着開釋，發往廣東，交張鳴岐差委……」汪等釋出以後，暫住泰安客棧。大難不死，等到袁世凱出山，因爲梁士詒和汪的大哥兆鏞是鄉榜同年，於是以鄉誼關係，特赴泰安客棧訪汪，代袁作說客，介紹袁克定見面。後來，清室退位，民國建立，汪又成了風雲人物。

勾結袁世凱·甘受利用

因爲汪精衛是同盟會的重要幹部，又坐過監，其革命功勳，世人皆知；而其聲望，也正如日中天。老奸巨猾的袁世凱，當然欲善加利用；於是入京以後，與汪多次晤談。民前一年農曆十月初七，袁在私宅宴汪，汪居然和袁的長子克定結爲金蘭兄弟，並且在袁的授意下，與楊度共組「國事共濟會」。

那時，各省代表齊集武昌，準備于十月初十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舉行革命軍各省區代表大會，討論與滿清政府的和戰問題。前一日初九，袁世凱却派朱啓鈴到武昌，帶了一封汪精衛給革命同志的親筆信，希望南北達成和議，聯合一致，要求清帝遜位，並推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這封剛剛來得湊巧的信，出自汪精衛之手，當然會影響到與會人員的看法和決定。十月十二日，竟然通過：「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世凱反正來歸」的決議。

汪精衛不但對武漢方面，替袁作說客；而且還電報在南京的黃興，提出以大總統爲交換條件，促袁參加革命的主張。黃興覆電汪，告以：「如果袁確能參加革命，即可舉袁爲第一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汪將此覆電交楊度轉袁世凱。袁在深得我心的心情下，仍假意謙辭：「大總統我不能做，應由黃興做」。

和談尚未開始，汪精衛已被袁世凱利用，替袁爲取得第一任大總統權位生根奠基。

十月廿七日，南北代表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汪精衛與楊度，在袁的指使下南下上海，汪因爲同盟會

的關係，成爲南方代表的參贊，住在首席參贊伍廷芳的觀渡廬，每天與袁有密電往來，向袁有所報告。自國父返國，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後，袁以不獲此位而翻雲覆雨，和談陷入僵局而轉入幕後，汪精衛與楊度變成主要人物。加以「讓袁」有成議在先，南方妥協份子又佔多數，竟流行一種「利用袁，可以事半功倍」的淺見，因此促請 國父讓位，由袁負責推翻滿清政府的交換條件更加成熟了。

袁世凱利用汪精衛對付南方革命軍外，並且還利用他對付滿清政府。

自南京政府成立後，北方革命黨人更趨積極，由蔡德辰、羅明典等聯絡北京、通州一帶毅軍各營，準備起事；不料事機不密，通州革命機關被破獲，蔡德辰等八人被捕。羅明典、張先培、錢鐵如等十餘人集議，決定先殺袁世凱，除去革命的真正障礙。於是于十一月十六日，乘袁上朝時，當街投彈槍擊，可惜祇中副車，袁得安然脫去。

在此之先，由於革命軍有願推袁爲大總統之議，所以滿州親貴認爲袁是賣主求榮，私通革命的奸賊。此事發生以後，袁又被看成是滿清的大忠臣。他即乘此向清廷要脅，一面請假不上朝，一面以辭職逼清廷宣佈退位。當時滿清親貴中，以良弼最有胆識才幹，主張批准袁內閣辭職，另組皇族的戰鬥內閣。袁想除掉此一勁敵，但又不便由自己下手。恰巧汪精衛由上海回到北平，袁乃採取借刀殺人、移花接木之計；對汪說明，清廷退位已無問題，目前的阻力是良弼，祇要殺死良弼，即可水到渠成。汪信以爲真，便去天津找到黃復生，叫他去殺良弼。黃復生找到四川同志彭家珍，前往北平，于民國元年元月廿六日，在良弼門

前，投彈炸死良弼。

良弼一死，清廷胆落；加以段祺瑞等四十二統兵將領，聯名電請清帝退位，確定共和政體。於是問題急轉直下，二月十二日清廷宣佈退位，二月十五日袁世凱當選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取得權位以後，爲了造成其稱王稱霸的勢力，當然不願意接受政黨政治，責任內閣的民主體制與精神。於是，第一步解散北方新興的黨派，第二步與同盟會爲敵。這時，汪精衛竟然獨善其身的遠遊歐美，沽釣成功不居的美名。其後，二次革命失敗，國父亡命日本，另組「中華革命黨」，以及民國五年討袁帝制之役；汪都逗留法國，坐觀成敗。未聞對叛國逆賊有一字的聲討，爲救國護黨有赴難的行動。

由雄辯滔滔的忠於主義，被捕不屈的壯懷激烈，而變成爲甘受利用的政客功狗，投機取巧的騎牆份子。汪之爲人，已經和以前判若兩人了；而其轉變之快，真令人爲之嘆息。而其所以如此，是否與結婚有關，值得玩味。

患難姻緣。「病受環肥」

提起汪精衛的夫人，大家都知道是陳璧君；其實，早在汪十六歲那年，他大哥兆鏞就給他訂親了。新婦是兆鏞同事劉子蕃的四妹劉文貞。汪考中秀才那年，女家曾經按照當地禮俗，購辦衣褂靴帽，贈送給末過門的嬌客。汪穿戴裝扮起來，玉樹臨風，到處拜客，也不知羨煞好多人，都以爲劉小姐得此佳婿呢。

自汪赴日本留學，參加革命，在「民報」鼓吹革命以後，名傳海內。兆鏞與子蕃惟恐清廷追查，株連受禍；再三函戒汪安份讀書，切莫妄爲。汪當時正在義憤激越之時，那甘就此放手退縮；於是想出一族「與「退婚」的辦法，以免萬一出事，連累家屬。兆鏞接到他要求與劉小姐解除婚約的來信，祇好轉達劉家，雙方互退婚書了事。

後來，汪精衛與胡漢民赴南洋宣傳革命，籌募經費，每到一處，均在公共場所講演時事。汪本有美男子的雅號，加以其實學口才，以致到處頗受歡迎。當他在檳榔嶼演講時，被當地陳姓富商的四女陳璧君發現，對汪一往情深。不但到處追隨捧場，而且把汪請到家中，慫恿母親，捐了一筆巨大數目的革命經費，她自己也參加了革命組織，跟汪到了日本，拜見國父；和何香凝、鄭毓秀住在一起，成爲少數女性同志之一，但從此主動追求汪精衛，噓寒問暖，看護病患，不避嫌疑。

汪北上行刺攝政王之役，陳也參加；僥倖未被逮捕，對汪在獄中的生活起居，關切備至，不時派人致送衣物，並且親繡一對枕頭，送給正在蒙難的意中人。因此，二人的情感，日益加深。一個嚴冬風雪的奈何天，汪正在思前想後，夜不成寐，陳却買通獄卒送上情書小簡一封，勉勵他「忍死須臾」。汪萬分感念之下，也仿顧貞觀以詞代書的筆法，填了一首「金縷曲」，送給陳，詞云：

「別後平安否？便相逢，淒涼萬事，不堪回首。國破家亡無窮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離愁萬斗。眼底心頭如昨日，訴心期夜夜常攜手，一腔血，為君剖。」

淚眼斜漬雲箋透，倚寒衾循環細讀，殘鐙如豆！留此餘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傷憊，愧戴却頭顱如舊。跋涉關河知不易，願孤魂縛護車前後，腸已斷，歌難又」。

這首悲壯悽惻的佳作，當時也曾賺人不少熱淚。民國建立後，汪的名聲更大，準備結婚出國，此時劉小姐已在醫校畢業，還希望能如當年初約，順理成章的成爲汪夫人，汪本人於陳、劉之間，何所取捨，大有魚與熊掌之難。他大哥兆鏞却以爲劉家已退婚，男女也未見面；既然陳曾共過患難，應當與陳結婚，於是汪精衛與陳璧君結爲夫婦，亦步亦趨，親密異常。

陳璧君矮而肥，自幼嬌縱，性情傲岸，主觀特強，心粗口快，絕不肯容納別人意見；除對 國父恭順外，目中無人。不但私下干預汪的事務，甚至當衆給人難堪，如或有人與汪談話時間較長，陳即不顧一切，當面對客人下逐客令：「汪先生事忙，身體不大好，你請便吧」，並且聲色俱厲。因此一般人對汪雖尊敬，但對陳則無不討厭。汪懾於她的雌威，每因怕麻煩而順從她的意思，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汪的爲人處事，自然會受她影響，至於後來接近汪的人士如陳公博、褚民誼、林柏生、陳春圃、陳君慧諸人，遭受她辱罵，便如家常便飯了。

汪精衛有這樣的妻子，真是他的不幸。無怪胡漢民晚年所著「讀王廣陵集」詩中曾對汪有如下的感嘆

「手如鐵索急蛟瑯，何意東坡有是非，不分少陵杼公論，一生受病在環肥」

這「一生受病在環肥」之句，真有畫龍點睛之妙。

投機善變 · 驟成顯要



汪精衛行刺攝政王事敗被捕後，特電奏請清廷開釋汪精衛的兩廣總督張鳴岐。

民國六年護法之役，國父在廣州組軍政府，被推為大元帥，電召汪返國，汪却于漫遊歐洲後始繞道西伯利亞返滬。不但不趕赴廣州，反而在上海組織「道德會」，以不參加政治為號召；仍然在觀望風色。次年，軍政府瓦解，代以七總裁的政學系政府；汪在上海主持「建設雜誌」。歐戰結束，我國為協約國之一，需派員前往法國，出席巴黎和會。北方徐世昌政府，為示全國團結，特保留部份代表名額，由南方推荐。南方政府派汪

爲和會代表。汪仍以清高姿態，懇辭不就；且又飄然赴日轉美，再以私人資格赴法國，並在舟中賦詩，大唱其：「故國未須回首望，小舟深入浪千層」的高調。

民國九年，軍政府恢復，國父返回廣州；汪由海外歸來，次年國父就任非常大總統，任胡漢民爲總參議，任汪爲廣東教育會長。汪又標新立異的發表六不主義，組織六不會，主張：「不做官、不當議員」。陳炯明叛變，國父被迫離粵赴滬，汪也隨往，奉派赴東北聯絡張作霖。

民國十二年陳炯明被驅逐，國父回粵，復任軍政府大元帥，決定「聯俄容共」政策，次年，中國國民黨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汪又活躍起來；不但起草大會宣言，而且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會後再赴北平，密與段祺瑞聯絡。

民國十三年冬，國父應段祺瑞、張作霖邀請北上，共商國事；胡漢民留守廣州，汪精衛隨行，先抵北平。國父北上的目的，想團結大家，對內召開國民會議，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段想包辦國是，對內分配軍政財閥的權利；對外爲了取得國際承認其執政地位，不敢提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事。南轅北轍，汪精衛事前的聯絡拉攏，顯然未發生作用。

次年三月，國父臨終之前，當着環繞榻前的家屬與同志，曾面對汪作語重心長的指示：

「當今無數敵人，正在圍困汝等，我死之後，彼輩更將向汝等進攻，甚至必有方法令汝等軟化。如果汝等強硬對抗，則又必將被加害，危險甚大。」

汪居然以代表羣倫的口氣，隨口應答：「我等追隨先生奮鬥數十年，從未巧避危險，此後危險何畏」？當即朗誦他事先起草，經過宋子文，孫科，孔祥熙商榷的國父遺囑稿，請求核定；國父欣然同意；而于三月十一日上午補簽字。

當國父北上時，廣州胡漢民負責留守；由於共黨份子的挑撥離間，與廖仲愷一派人，形成水火。國父逝世以後，共黨把握到擴大製造國民黨分裂的最好機會；於是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策動牽引下，捧出汪精衛爲左派領袖，聯合廖仲愷以打擊被他們稱爲右派的胡漢民。

胡漢民當時是代理大元帥，權位最高。汪這時已非常熱中權勢地位，眼看左派有蘇俄的背景，聲勢顯赫；而其嬌妻陳璧君，又受到廖妻何香凝的游說，慫恿他取代胡的領導地位。於是他不顧與胡漢民多年的深厚友情，不顧他過去曾經反對「聯俄容共」的立場，不以其黨的聲望，從促進團結上去領導羣倫；而竟惑於一時的勢利，欲藉傾軋而奪取領導地位，乃自降身價，自貶格調，以左派領袖自居，任人擺佈了。

民國十四年六月十四日，胡漢民在廣州大本營召集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改組大元帥府爲中國國民政府，採委員會議制的「集體領導」制度。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由于鮑羅廷、廖仲愷等事先安排，汪精衛當選爲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主席。胡改任外交部長，廖任國府委員兼財政部長、廣東財政廳長、軍校黨代表等要職。

自此以後，汪便在鮑羅廷的指揮之下，着手進行排斥以胡漢民爲首的所謂右派，而從此國民黨內部的

分裂紛爭，也就越來越嚴重了。

受俄共操縱·製造分裂

民國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改組大元帥府爲國民政府後，由於汪精衛受鮑羅廷操縱，共黨份子竊篡國民黨的陰謀活動日益猖獗；國民黨員的不滿情緒，也日益高漲。青年部長鄒魯便曾責難：「鮑羅廷和汪精衛這樣壟斷下去，中央黨部等於不復存在。」鄒兼任廣東大學校長，爲了提防青年學生受共黨誘惑，所以在校內散發反共傳單。於是，共黨份子便詆毀廣東大學是「反革命大本營」。

恰巧，八月廿日發生廖仲愷被刺死的事件，於是共黨乘此製造糾紛，對胡漢民及所有反共的忠貞而資深的國民黨員加以排斥。

暗殺廖的凶手陳順，當場被擊斃，失去追問主使人的最可靠線索。國民政府重視此一巨案，立即成立「特別委員會」，由汪精衛、許崇智和蔣校長中正爲委員，負責調查處理本案。

因爲朱卓文和陳順有過關連，林直勉曾經對廖的親共懷過敵意，胡毅生（胡漢民的堂弟）曾因反對廖的容共而有過嚴厲批評；所以他們三人的嫌疑最大。特別委員會於八月廿五日下午令拘捕他們三人；除林直勉就逮外，胡、朱均已潛離他去。

鮑羅廷却夥同汪精衛，立即提出逮捕名單，竟然包括鄒魯、胡漢民、鄧澤如、謝持等國民黨有力人士

在內，準備大肆羅織株連。如此藉題構陷，當然被許崇智和蔣校長所拒絕。可是，鮑羅廷並不就此罷休，仍然用盡一切手段慫恿共產黨徒，製造「肅清右派」的高潮。

汪精衛利用這個機會，于九月十五日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提議：「請胡漢民同志去蘇聯接洽」。於是，胡遂以「赴俄養病」及「協商關於政治經濟的一切重要問題」的名義被放逐出國。接着，鮑羅廷又在政治會議提議派遣黨的重要人員前往華北宣揚革命宗旨；汪在鮑羅廷的示意之下，提舉一向以反共著稱的常委林森和鄒魯。「調虎離山」，不但又放逐了兩位「勁敵」，而且立即以共黨林祖涵和譚平山，遞補二人的中央常委遺缺。

林、鄒被迫繼胡漢民之後離開廣州，看到黨的危機，決心公開揭發反共旗幟。因此，先往上海與反共的戴季陶、謝持、邵元冲、葉楚傖協商；然後于十一月廿三日在北平西山碧雲寺的國父靈前，舉行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第四次會議，（即西山會議）出席中央常委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陽、石瑛、戴傳賢、邵元冲、沈定一、葉楚傖、鄒魯；列席中央監委吳稚暉、謝持、張繼。決議「取銷共產黨員加入本黨者的黨籍」，並發表宣言，開除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張國燾的國民黨籍，十二月四日，再決議開除汪精衛黨籍二個月及其中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並宣佈其罪狀，要點爲：

1. 任憑鮑羅廷操縱本黨中央，並操縱國民政府。
2. 廖仲愷被戕後，聽鮑羅廷嗾使，放逐胡漢民。

3. 特擢在十八個月中請假十四個月的毛澤東爲中央宣傳部長。

隨即，于十二月十四日接收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上海執行部的辦公地點，設立「中央黨部」，別立門戶，處理黨務。

於是，中國國民黨乃面臨「西山會議派」和「廣州派」的分裂危機。

汪精衛受「西山會議派」的攻擊，甚至「開除黨籍」當然不甘心，當然要反擊。鮑羅廷却正好利用此機會，以報復「西山會議派」爲名，想把國民黨的老同志排除淨盡。當即于民國十五年元旦，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二全大會，提出處分「西山會議派」的問題，在共黨份子把持下，通過「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決定永遠開除鄒魯、謝持黨籍，書面警告林森、張繼、居正、邵元冲等，責其悔過，並限兩月之內書面具覆，否則也開除黨籍。

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爲了對抗廣州的「二全大會」，也于三月廿九日在上海召集廿七省區代表一百零七人舉行另一個「二全大會」。

在國父逝世僅僅一年之間，由于汪精衛受共黨份子的操縱愚弄，已使國民黨陷于嚴重分裂的地步。

阻撓北伐·負氣出走

在「西山會議派」和廣州中央發生嚴重分裂危機時，蔣校長和孫科曾經爲促進黨的團結而努力，沒有

成功。蔣校長有鑑於繼承 國父遺志，應當先剷除革命障礙，統一中國。因此，他在「二全大會」中，曾提出北伐進軍的主張。會中與會後，汪精衛均表示贊成，鮑羅廷也未反對。可是，當鮑羅廷以奉召返俄述職以後，情況突變。首先俄國軍事顧問團長季山嘉，忽在軍校會議中，宣傳「北伐必敗」的謬論。接着，廣州市面接連的散發傳單，反對北伐，並且攻擊蔣校長為「新軍閥」。最後季山嘉明目張胆的破壞「北伐計劃」，甚至以「參謀團」的名義，不理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決議，擅自削減軍校經費，延擱撥發官兵薪餉，陰謀破壞黨軍將士對蔣校長的信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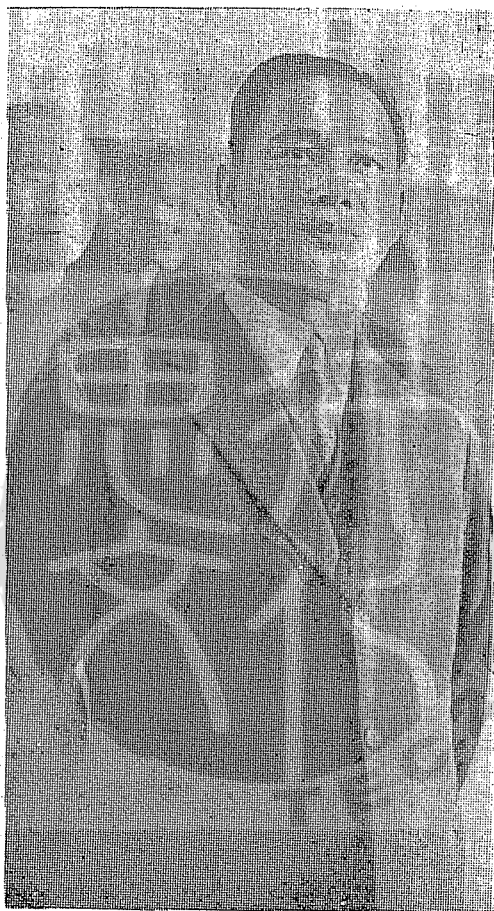
共黨份子並以往日挑撥汪精衛與胡漢民，強分派系，製造矛盾的慣技，製造汪、蔣之間的新的矛盾。因此，在共黨的播弄之下，汪精衛也以致贊成的立場而附和季山嘉等說法，態度曖昧了。

蔣校長以其繼承 國父志事報効黨國的願望，無法實現，而黨的處境岌岌，也亟待衝破難關。於是，于二月八日九日，先後請辭國民革命軍總監、軍委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等職，以去就來促使汪精衛反省醒悟。

可是，汪精衛對蔣校長的辭呈，既不批准，也不挽留，留中不發者半月之久。

二月廿七日，蔣校長訪汪，明告其如不准其辭職，就應令季山嘉返俄。三月八日，再訪汪，痛陳：「革命實權不可落入俄人之手，即與第三國際聯繫，必須定一限度，不可喪失地位。」汪不但不接受忠告，反而將此祕密談話內容洩漏給季山嘉。

季山嘉利用少數軍事將領的功名利祿心裏，直接煽動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叛變；但被蔣校長發覺，將王免職、逮捕。季山嘉一計不成，再策動共黨份子，公開對蔣校長作人身攻擊。三月十四日，汪精衛仍不批准蔣校長的辭呈，暗示他自行離開廣州。



翻雲覆雨，口是心非的汪精衛。

「自行離開」等於棄職潛逃，當然蔣校長不能如此，於是又出現駭人聽聞的「中山艦事件」。

「中山艦事件」是季山嘉的毒計，因為中山艦是當時蔣校長往返廣州與黃埔間的座艦，他們企圖于蔣校長登艦後劫持他，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

的惟一障礙。

這個陰謀也被蔣校長事先發覺，乃毅然于廿日清晨宣佈戒嚴，逮捕中山艦長李之龍，各軍黨代表中的共黨份子，收繳共黨所操縱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槍械。

此一強硬舉措，才使俄國顧問與共黨份子的囂張氣焰，爲之收斂；而季山嘉和一般陰謀詭計的俄國顧問，不得不鐵羽而歸。

蔣校長處理此事變後，立即訪晤汪精衛，報告經過。汪不但不震驚此事的嚴重性，反而因蔣校長事先未與他商量而不愉快。殊不知如事先與他商量，則證之前事，他必橫生阻撓，或竟洩露給季山嘉；那麼，當斷不斷，稍縱即逝，黨國的命脈可能就此斷送。

在此情勢之下，汪竟然負氣的不敢面對現實而躲藏起來，表示不願再負政治責任。五月，悄然離粵前往法國。

寧漢分裂·口是心非

共黨的陰謀敗露，汪去法國，北伐的阻力也告消失。於是，國民政府決定北伐，于四月十六日推選蔣校長爲軍事委員會主席，六月五日任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七月九日誓師北伐。一路勢如破竹，至民國十六年三月，已經克服兩湖、江西、江蘇、安徽、福建、浙江等省。

俄共方面，雖然因爲中山艦事變，使他們篡奪中國國民黨的陰謀受到一時的遏制；但他們並不死心，仍然以暫時讓步的姿態，留在國民黨內，再等待時機與風作浪。

在史大林的幕後操縱之下，回到中國的鮑羅廷，竭盡各種可能，製造分裂，實行「倒蔣」。首先由共產黨的機關刊物評論：「北伐軍沒有得到羣衆的支持」，「黨的權威，應該在軍事領袖之上，黨應該支配一切」，以煽動「反蔣」情緒。繼而，利用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唐生智權位野心，以擁戴他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爲釣餌，使他參加爲「倒蔣」的要角；同時再發動中共黨徒，把持武漢政府及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原決定遷武漢，但經過南昌時，武漢先已成立左傾政權，故暫留南昌）一面電促「反蔣」要角汪精衛迅速返國，一面于四月一日免除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的職務。

汪精衛回到上海，吳敬恆與宋子文曾往迎接，他好像對共黨的陰謀已有若干瞭解，曾對吳敬恆表示：「共黨素來不輕易變更所定政策，共產黨實以國民黨爲利用品，本人亦不贊成共產黨之階級革命及勞農專政。且據本人觀察：國民黨與共產黨亦不易繼續相安；但本人希望暫能維持合作，自己願負調和之責」。

蔣總司令爲示謙退的熱忱，曾經通電全軍將士，歡迎汪歸國領導黨政，自己專司軍令。並曾數度與汪晤談，懇切告以爲謀自共產主義者手中挽救國民黨，必須實行「清黨」；並要求汪留在上海，幸勿前往武漢。汪並與蔣總司令、張人傑，以及各軍事將領會談，決定合作，處理一切內政、外交問題。

然而，汪口是心非，却悄悄的與共黨份子陳獨秀、周恩來接觸；突然于四月五日與陳獨秀發表「汪陳聯合宣言」，表示：

「中國國民黨同志，凡是了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中國國民黨真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 孫總理的聯共政策」

國父的「容共」，被汪曲解擅自改變為「聯共」，而公開宣言，真是荒唐之至；加以他朝秦暮楚，自食前言，招致國民黨同志的失望與憤怒，紛紛詰問。他却避免答復，于四月六日前往武漢。

上海一帶的共黨份子活動猖獗，企圖以暴力密謀叛亂，四月二日南昌的朱德等共黨份子掀起一場暴動，襲擊黨政機關，拘捕幹部，搶劫市民。於是，蔣總司令接受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決議，下令于四月十二日由上海起開始清黨，清除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四川等省的共黨。十八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推舉由俄返國的胡漢民為國民政府及中央政治會議主席。

由上海前往武漢的汪精衛，却成為被鮑羅廷等俄國顧問與中共黨徒所規持的傀儡，絲毫不能有所主張。俄國的政策，以為中國共產革命的高潮到了，於是透過史大林的指示，欲加強實施沒收土地，組織工農新軍隊，成立革命法庭，在共黨的領導下，審判反動軍官等暴虐行動。同時，兩湖人民不能忍受共黨恐怖政治和社會鬥爭，更不能忍受「現金集中」和「糧食集中」的政策。於是各地農民蜂起，反抗共黨的操縱與控制；進而影響到以農民出身為多的軍隊，都紛紛起而反共。因此，汪精衛在時勢的逼迫之下，不得不

于七月十五日提起實行「分共」的主張，廿七日，鮑羅廷離華返俄。武漢的左派政府于八月五日下午令取締共產黨，八日，緝捕共產幹部。

由於南京清黨與武漢分共，國民黨的容共政策乃告終止。

當此次汪精衛回國之初，蔣總司令曾勸他，當前問題的癥結在「清黨」，祇有把中共排除於國民黨之外，黨才能真正的團結；並且勸他留在上海南京，不要去武漢。汪不聽，竟以「聯共」的立場去到武漢。僅僅三個月，就為情勢所逼，不得不改變初衷，而與南京同一步調，實行「分共」。照情理講，過去他之所以與蔣總司令發生意見，是爲了對中共的政策問題，現在既然事情明朗了，汪且于八月六日發表其「錯誤與糾正」論文，承認自己有錯；就應該捐棄前嫌，與蔣總司令精誠合作，爲完成 國父革命的精神志業，繼續奮鬥。這在當時，無論於私於公，都是理所當然的事。

可是，事實出人意外，一個新的分裂和一連串的黨政糾紛，却又因爲汪精衛的舉措乖張而層出不窮的演進起來，而其結果，汪本人却落得個不爲各方所容所諒，再度鑿羽出國。

倒蔣聯蔣·翻雲覆雨

原來，此時汪已有自己的派系「改組派」，在陳璧君、陳公博等人的慫恿之下，與有割據野心的唐生智聯合起來，實施他一面「驅共」一面「倒蔣」的策略，除了由唐生智于八月八日在武漢發表「倒蔣」

通電，出動軍隊準備奪取南京外；汪本人特致函在南京的國民革命軍主力之一的第七軍軍長李宗仁勸他也參加「倒蔣」行列。

李宗仁、白崇禧受汪誘惑，于八月十二日在南京舉行的中央執監委員會中，主張遣使與武漢議和，並暗示要求蔣總司令辭職以爲交換條件。

蔣總司令爲了促進團結，坦然于八月十三日發表「辭職宣言」，即返奉化靜居。南京方面的黨國元老胡漢民、蔡元培、張人傑、吳敬恆、李石曾等也與其共進退，隨同離職赴滬。

八月廿日，汪精衛、唐生智等離武漢向南京進發，在九江與李宗仁等會商，滯留四日，突然孫傳芳以七萬人之衆，乘虛渡江進攻南京，國民革命軍奮起抵抗，遂進行龍潭會戰。

慘烈的龍潭會戰，給國民黨各方面很大的教訓；於是全面團結的一致要求下，南京、武漢、上海（即西山會議派）三方面于九月十一日舉行正式談話，決議在「四中全會」前，先由三方面推出特別委員組織特別委員會，統一黨務。十六、十七日兩次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組織，以及各部門的人選。廿日，各部門宣告成立，發表宣言。表面上已結束國民黨自民國十四年底以來的分裂狀態，而一直維持到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產生新中央執監委員會之前，但實際上仍未做到真正的團結。

首先，汪精衛因爲未能被選爲中央特別委員和國民政府的主席大失所望，隨即偕唐生智返回武漢，不聽號令，自行其是；一面以其「改組派」攻擊中央特別委員會「不合法」。

在南京的國民政府，以唐生智公然稱兵叛變，乃明令討伐，在第一、三、六、七各軍的合兵征討之下，唐迅告失敗，下野出國，汪則悄然前往廣州，以張發奎的第四軍爲骨幹，企圖以廣州爲基地，自成天下，再搞分裂。惟當時廣州係由籍隸廣西的李濟琛與黃紹竑等坐鎮，汪如欲達其願望，尙需另費手脚。

中央大局，自蔣總司令辭職後，中樞無主；北洋軍閥捲土重來，共黨連續暴亂，社會不安，險象環生。若干將領感覺到非敦請蔣總司令復職，國民革命軍即無法團結，國民革命也無成功之望；當前情勢，尤將無以善其後。於是，自十一月中旬起，馮玉祥、閻錫山聯名通電各省，請一致擁戴蔣總司令統軍北伐，並電蔣總司令，保證：「弟等負弩前驅，願請指揮」。何應欽也屢電敦勸，李宗仁則表示「請蔣總司令復職，但不主張蔣汪合作」，廣州的李濟琛却主張「蔣汪合作」。

大勢所趨，汪也不得不改變立場，改「倒蔣」爲「聯蔣」，由廣州赴上海，于十二月十日，偕同何香凝、陳璧君、甘乃光、顧孟餘、丁惟汾等，正式向國民黨四中全會預備會提案，敦請蔣總司令復職。

可是，在廣州的張發奎却乘李濟琛北上開會的機會，于十二月十一日，與所部黃琪翔發動一次政變，將代理李留守廣州的黃紹竑驅出廣州，於是激動了附近的廣西部隊，起兵討張黃。張黃率重兵出境迎戰，廣州空虛。共黨趁機發動第二次廣州大暴動，屠害軍民達二千餘人，並且竊據廣州，組織蘇維埃政府。張黃見闖了大禍，立即回師，經過激烈巷戰，始於十三日克復廣州。可是，此一巨變，使廣州蒙受空前未有的嚴重劫難。大家痛定思痛，一面主張立即與幕後主使的俄國絕交，一面嚴厲指責釀此巨變的禍首張黃。

而汪精衛却仍一意袒護張黃，飾詞辯解；張黃也通電迎汪回廣州，自成局面。因此激起全國公憤，通電上呈國民政府，要求立即討伐張黃，並通緝汪精衛、何香凝、陳公博、甘乃光、顧孟餘、陳璧君、陳樹人、王勤等「改組派」人物。各級黨部人員慷慨激昂，不惜以去就力爭。

至此，汪精衛自知無法在國內立足，更談不到取得領導地位；乃于十二月十七日，再度悄然出國。翻雲覆雨，自食惡果。

擴大會議·鬧劇垮台

當時，國內情勢繼續惡化，中樞無主，已不容蔣總司令長此置身事外。自汪出國後，國民黨內部團結障礙已告消除，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決議敦請蔣總司令赴寧主持中樞大政，並且先自辦理結束。於是，蔣總司令乃于民國十七年元月四日前往南京，九日，通電繼續行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

蔣總司令復職後，使原來紛亂的局面，頗為開朗。北伐軍區分爲四個集團軍：第一集團軍，約廿九萬人，由蔣公秉總司令，由津浦路北進；第二集團軍，爲河南及西北一帶的部隊，約卅一萬人，由馮玉祥任總司令，由隴海北向平漢路；第三集團軍，爲山西部隊，約×萬人由閻錫山任總司令，一面東出，會攻平漢路，一面出綏察，南攻北平；第四集團軍，係兩湖及廣西軍隊，約廿四萬人，由李宗仁任總司令，爲預備後進之師。各軍在蔣總司令的統帥下，團結一致，自四月至六月，短短的三個月時間，即已攻克平津。

年底，張學良在東北通電服從國民政府，易用青天白日國旗，全國統一。

民國十七年八月四日，中國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二屆五中全會，根據 國父民權主義，確立五權政體，準備裁減軍隊，計劃于次（十八）年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十月，選任 蔣公爲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譚延闓、胡漢民、王寵惠、戴傳賢、蔡元培爲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院長。

裁軍，是當時政府迫不及待的要政。因爲全國歲收每年僅四億五千萬元，而軍費每年即需五億元；而且國家已經統一，也無需養此二百五十萬份子複雜的軍隊。于是，政府乃于民國十八年一月，成立國軍編遣會議，決定全國陸軍不可超過六十五師。

可是，當時擁兵的將領，如武漢的李宗仁、中原的馮玉祥、華北的閻錫山，均欲擁兵自雄，形成割據局面。二月下旬，武漢的桂軍擅自侵入長沙，驅逐中央任命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雖經中央政府下令雙方軍隊駐守原地，不得自由行動，但桂軍仍悍不遵從。

三月，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精衛以其本人及「改組派」人物未能在新的黨政機構中取得重要地位，乃乘機利用裁軍問題的矛盾，與李宗仁等勾結。十一日，汪等十三人發表「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叫出「黨要民主化」的口號，反對「三大大會」。而在湖南的桂軍，更向友軍猛攻不已，擴大叛亂。結果，「三大大會」通過警告汪精衛，開除陳公博、甘乃生等黨籍案，國民政府也下令討伐李宗仁等。

討李的軍事，進行極爲順利，四月五日，蔣主席即已進駐漢口，李部瓦解。汪雖受挫，仍不甘心，再

以「護黨救國」爲號召，密派黨羽，與馮、閻、李等所有反對編遣的將領聯合「反蔣」。

八月，中央再召開編遣實施會議，希望貫徹初衷，建設國家。於是，汪的黨羽張發奎，首先于九月十八日在宜昌宣言獨立，主張迎汪爲黨的最高領袖，接着，廣西的李明瑞、楊騰輝，河南的唐生智部（唐已由海外返國，接受中央委令）還有馮、閻兩部將領，紛紛以「護黨救國」的名義，號召「反蔣」，但大家的步伐凌亂，各爲私利。不久，張發奎返粵後爲陳濟棠所敗，李、楊爲桂軍所敗，唐部及石友三部均被中央擊破；「反蔣」之局，又告瓦解。汪又由香港出走新加坡。

汪到新加坡，起初還以調人自居，說些悲天憫人的風涼話。民國十九年一月十日，居然又通電願與蔣主席同時下野，一面却積極以其「改組派」政客，與反中央的各集團聯絡，推波助瀾。二月廿四日，以閻、馮、李爲首的晉系、西北系、桂系各級將領四十五人通電提出「黨統問題」，反對中央；汪立即通電響應。三月十五日，叛軍擁閻爲海陸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張不知情）爲副總司令，廿日，中原大戰開始。四月七日，由汪精衛起草的「北方黨務問題宣言」稿拍抵天津，主張另行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以叛逆終不悔悟，乃于五月，由蔣主席誓師討逆。

討逆軍事，在南方頗爲順利，侵入湖南長沙的張發奎、李宗仁軍，被坐鎮武漢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和廣州中央軍的夾擊，全部潰敗；李、白退桂林，張發奎下野。可是，中原一帶，戰況激烈，尤其山東方面，濟南且已淪陷。閻、馮乃電促汪北上，商組新政府；於是，各地叛逆份子，爭赴北平。汪抵平後，于七

月十三日與閻、馮等組成「擴大會議」，自認爲新的「國民政府」，以汪、閻、馮、李、唐（紹儀）爲國府委員，發表總宣言。其實，份子複雜，意見紛歧，什麼「民主集權」、「村治救國」、「擁閻治國」，完全雜湊胡縐，根本談不上政綱政策，更談不到爲國爲民。

但，中央軍却在蔣主席臨危鎮定，指揮若定之下，于七月廿一日一舉擊潰馮軍的主力，克服亳州；山東方面，也轉敗爲勝，克服濟南。

叛軍整個覆敗已在目前，九月一日，「擴大會議」仍公佈「國民政府組織大綱」，推選閻、馮、汪、張（學良）爲國府委員，而以閻爲主席；並以「政府」半數部長人選由張安排的交換條件，要求張出兵贊助支持。開口「護黨救國」，竟然開出如此條件，連袁世凱時代的軍閥作風都不如；縱或因此而成功，真的打垮了中央政府；試問如此「新」的雜湊班政權，將成何等世界？

幸而，張並未受彼等誘惑，反而深明大義的宣佈服從中央，隨即派軍入關；而中央軍也已勢如破竹的攻克許昌，直指鄭州，對叛軍形成大包圍態勢。

於是，「擴大會議」鬧劇垮台，汪等紛紛逃入平津兩地租界。十一月，閻、馮通電下野，交出兵權，中央軍進入西安，討逆戰事結束。

當民國十七年底全國統一之後，本可以偃武修文、埋頭建設，舉國一致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可是，由於汪精衛一人一派的始終搗亂，鼓惑軍人，爭權奪利，破壞統一；以致各地叛亂時起，使中央軍南征

北討，應付不暇。而各戰區生靈塗炭，哀鴻遍野；中原大戰，雙方死傷，且達廿四萬人之多。最可痛惜者，在敵國外患虎視眈眈之下，我國竟因為內爭，對消了無數國力，浪擲了兩年寶貴時光；以致後來對付日本侵略，飽受捉襟見肘之苦；至今回憶，能不痛惜慨嘆！

利用胡漢民事件乘機再起

蔣主席救平了全國各地反叛中央的動亂以後，爲了迅速而真正的開始訓政，從事國家建設；以期早日過渡到憲政時期，還政於民，實行民主政治。特別寬大的採取特赦一再反覆的北方軍政領袖和一般政客立場，並且容納若干國策意見；而提出一個五點計劃：

(一) 完全根絕共產主義與共匪。

(二) 整理全國財政。

(三) 發展廉潔而有效的國家行政。

(四) 發展全國經濟。

(五) 發展各省縣地方自治；交由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討論通過，作爲召開全國國民會議的準備。

召開全國性「國民會議」，本是國父中山先生多年奮鬥的目標，在其遺囑中曾有：「務期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昭示；而實施訓政，制定約法，也是當時必不可緩的大事。蔣主席此一舉措，雖爲各方所

接受；可是却爲始終和他立場一致的胡漢民所堅決反對。

胡主張在訓政時期，由國民黨負責，以黨治國；而反對蔣主席的做法（包括擴大政府基礎）。但胡與其同僚熱烈辯論後，大多數同仁贊成蔣主席的主張；於是他即自行辭去立法院院長的職務。

監察院因爲胡阻撓「國民會議」，反對約法；於是對胡提出彈劾。蔣主席鑒於年來國內叛亂頻仍，大都以某一衝突事件爲藉口，以致稱兵犯上，兵連禍結；惟恐再有人以此假借胡的名義，興風作浪，滋事生非。所以他希望胡能暫留首都。然而外人不明真相，再加失意政客的藉機挑撥；於是有些一向和胡較爲接近的黨內同志，對胡的辭職和留京；誤解係受到壓力，受到限制。

民國廿年五月五日，全國性「國民會議」在南京召開，出席代表四百四十七人，包括國民黨、農會、工會、商會、工業團體、教育會、大學校、自由職業、以及蒙古、新疆、海外華僑等代表；就面對的國家重大問題鄭重討論，通過要案多起，並且通過「訓政時期臨時約法」；規定人民在訓政時期應受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四種政權訓練，保證人民有集會、出版、與言論的自由，保障私有財產的權利。

「臨時約法」的通過與實施，可使人民於執行政權以前，對於民主的要素，得到廣泛的經驗；可使中國，由一黨政治過渡到民主與自治的地位；這正是國民革命以來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如果全國上下團結一致的順利貫徹實施；那麼預料到民國廿四年，各地的地方自治，至少有半數省份以上可以完成；就可以開始準備實行憲政了。

可惜，「國民會議」所預定的進展程序，和這千載一時的建設機會，却因爲新來的內叛，和外來的侵略，而受到嚴重的影響。

新來的內叛，起自南方，廣東陳濟棠受到古應芬的游說，以胡漢民事件爲藉口，在廣州發難，驅逐省主席陳銘樞，自兼省主席。汪精衛見有機可乘，又回到廣州，鼓動過去反中央的南方人士，結合粵、桂、胡、汪各系，再成「反蔣」之局。當組成「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廣州爲基地，成立名義上獨立的南方「國民政府」；由汪精衛、唐紹儀、陳友仁等領銜發出通電，要求蔣主席下野；陳濟棠且已組織「北伐軍」，公開準備戰爭。

另一方面，共匪自民國十六年被排出國民黨後，即以「蘇維埃路線」的赤裸面目與羣衆相見；截至當時，武裝活動已遍及湘、贛、粵、桂、閩、皖、豫八省，建立十五個游擊區，形成足以燎原的情勢。

當此國內問題嚴重之時，日軍又發動「九一八」事變，出兵竊佔我東北四省。蔣主席處此內憂外患之際，對外立即籲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對內則對南方呼籲和平，特派代表赴粵，促進團結。可是，南方（尤其胡漢民）却堅決以蔣主席下野爲先決條件。蔣主席當然不願以個人的去留，影響到整個的和諧團結，乃于十二月十五日辭去政府一切職務，返回奉化。

這時，汪又在上海舉行選舉會，產生一批「改組派」的「中央委員」，乘機要求納入中央黨部，以爲和平條件之一。

民國廿一年元旦，國民政府改組，以林森代理主席，孫科、陳銘樞爲行政院正副院長，陳友仁爲外交部長。蔣公、胡漢民、汪精衛爲國民黨中政會三常委，指導與決定國策。但胡已去港，蔣公已返奉化。

政府改組，由於蔣公離職，失去重心，基礎極不穩固；而軍事、經濟，問題也很多；各地民衆，人心惶惶。國難時艱，有識之士，都以爲非請蔣主席復膺政府大任，不足以言救國。中央政治會議乃開緊急會議，敦請蔣公返京共商大計。於是，汪精衛「倒蔣」、「反蔣」，又去杭州「迎蔣」，連名促請胡漢民入京，共商國是，胡不應。而日軍又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因此，蔣公不得不再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負責救國；而汪也如願以償的出任行政院長，演變成「蔣汪合作」之局。

「屈辱外交」焦頭爛額

汪出任行政院長，自居爲責任內閣，對地方的外交方針也欲親自面授機宜，因此，在北平與張學良發生誤會。汪以爲張祇知服從軍令而藐視行政院長的職權，甚至避不見面；是對他個人的莫大侮辱。於是利用國人對張放棄守土的惡感，通電痛責張；並採取他一貫憤然出走的作風，于八月一日出走上海，通電辭行政院長職務，促張也同時下野，以謝國人。

汪的這封通電，說得冠冕堂皇，張不得不同時辭去「華北綏靖公署」主任的職務。可是，日軍侵犯未已，中央對北方軍事，尙來不及作大幅度調查；於是，再在北平成立軍事委員會分會，任張爲代理委員長

，仍統率東北軍，暫維大局。汪以爲其面難下，乃于十月廿三日又負氣放洋德國，由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

。民國廿二年二月，熱河戰爭又起，湯玉麟不戰而逃，日軍進攻長城各口，威脅平津，三月，蔣委員長親自北上，部署抗日戰事，下令以軍政部長何應欽接替張學良，指揮長城抗戰軍事。汪精衛在德國寂寞無聊，也自覺前次因不忍小忿而放棄大權之非；乃又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爲由，返回國門，假裝堅請開除行政院長本缺，願以黨員與國民身份盡瘁國是。結果，當然得到慰留；不但復任行政院長，而且兼任外交部長。北方的戰爭，相當激烈，國軍堅強抵抗，予日軍重創；政務方面，成立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黃郛爲委員長，替汪負緩衝之責；因此，才有五月卅日滄沽停戰協定的簽訂，華北暫保一時的平靜。

但自是年八月宋子文美棉借款成功，在倫敦簽訂白銀協定，並與國聯成立技術合作以來；引起日本的不滿。公然採蠻橫無理的干涉政策，宣稱：「日本堅決反對中國與國聯合作，因日本在亞洲負有特殊之使命；凡與中國有關之事，日本與各國的意見不盡相同。故中日應直接交涉，反對列強干涉」。

汪此次就任行政院長，曾自命爲「跳火坑」，並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說。由於其不够堅定的特性，對日本層出不窮的無理要求，難免有過於牽就之病。民國廿四年元旦發表的「救亡圖存方針」，二月十三日的「取締排貨令」，以及六月十日的「睦鄰令」；甚至根據日方建議，修改教科書，取締宣傳及

教育的排日思想。都被各方指斥他所主持的是「屈辱外交」，使他感到焦頭爛額。

多年來，汪利用兩廣與中央的矛盾，挑撥播弄，各要員忽進忽退，退而復進，大都仍能保持相當權位，（胡漢民自甘淡泊，張發奎下野出國，又當別論）惟有過去掌握軍權曾任方面的李濟琛，陳銘樞失勢失所，雖然他們曾于上年年初，在福建與舊部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等發動一次政變，企圖聯合盤據江西的共匪，另創天下；但迅即被中央收平，他們反省痛恨之餘，亟欲再掀政潮，而尤以先殺專利用別人的汪精衛為快意。於是賈通職業凶手，于廿四年十一月一日，乘汪出席中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中央黨部前集體照相時，行刺暗殺。

當時變起倉卒，汪被擊中受傷倒地。陳璧君及改組派人物。一向對中央成見很深；因而多方揣測，陳且口出惡言，懷疑係蔣公授意。可是凶手孫鳳鳴當場死亡，無法查究何人主使，難明真相。幸而戴雨農由凶手所假借的晨光通訊社，查出線索，知道凶手的同黨要犯余立奎等已逃匿香港；於是戴排除萬難，派員赴香港，將余立奎等引渡回國法辦；據供稱係李濟琛、陳銘樞所主使，王亞樵所僱用，一場誤解，才告消除。

汪既受傷住院，不得不辭去行政院長及外交部長。六中全會乃改推胡漢民為中常會主席，汪為中政會主席；蔣公為此二會之副主席，並兼行政院長，張羣為外交部長。

民國廿五年二月十九日，汪又飄然出國。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西安事變；汪認爲是他個人重握政權的大好時機；於是以「急公赴難」爲由，不俟召而歸。可是，當他兼程趕抵上海時；西安事變已結束。他即發表言論，反對「人民陣線」，反對「假民主主義之名而圖分裂中國」；完全站在極右端的立場，和武漢時代判若兩人。

低調反戰、潛逃投敵

民國廿六年，由於日軍漫無止境的侵略，中日雙方的若干問題，已無法循外交途徑獲得解決；而國內上下，也都激於憤慨，不惜一戰。「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的歌聲，到處傳遍。因此，蘆溝橋事件，一觸即發，全面抗戰，從此開始。「八一三」滬戰爆發後，中央組織「國防最高會議」，以爲國家決策機構，蔣公及汪，分任正副主席。但，汪實際上是主和的，對抗戰前途，並無信心；祇是限於當時客觀形勢，無法說出也無法實現他的主張而已。

南京淪陷前後，德國大使陶德曼曾經出面調停和平。但由於日軍的條件太苛，且堅持談判時不停戰；所以我國未予接受。爲表示長期抗戰的決心，政府宣言遷都重慶，蔣公專心軍事，行政院長兼職改由孔祥熙繼任。

日軍既未能速戰速決，又無法以勝逼和；惱羞成怒之餘，乃于民國廿七年一月十六日發表不以蔣公主持的國民政府爲交涉對象；而希望引誘我國因和戰問題，演成分裂狀態，有人出面自動推翻蔣公，代表政

府，與謀和議。

汪以孔既接行政院長，自己再無重作馮婦之望；再因戰局的不利，以為不可能反敗為勝，於是，他對其個人和國家的前途，都抱悲觀的看法。自日本近衛首相宣佈不以蔣公為交涉對象後，他又犯了覬覦多變的老毛病；與一般失敗主義者周佛海、高宗武等往來甚密，當時，一般人士，以彼等言論消極，稱之為「低調俱樂部」。

雖說，自是年三月至七月，汪已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以及國民參政會議長等要職，足以發揮其個人才能，報効國家，然而，汪的「惟一領袖」私慾，始終作祟。不但暗中利用高宗武、梅思平之流，與日本勾結；甚至不惜公開大倡其「反戰論」的低調。

是年十月間，正當武漢會戰緊張時期；汪居然對海通社的記者公開談話：「中國在抵抗侵略時期，初未關閉第三國調停之門；但和平能否成功，需以日本和平提議之內容為斷」。此論引起各方怒斥：「主和者就是漢奸，想做漢奸的滾出去！」

不久，武漢，廣州相繼淪陷，汪訪蔣公談至深夜，以為抗戰前途，必敗無疑；而力主即與日本謀和，未為蔣公接受。十一月三日，蔣公再繼「為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之後，發表演說，聲明：「今後只要國民團結抗戰，日本進攻，毫不足懼」。

十一月十五日，代表汪精衛和日本勾結的梅思平，高宗武，在日本東京，和代表日本的今井武夫，影

佐禎作，簽訂了一項「中日邦交新案」；作爲汪代表中國政府與日本進行和平停戰的準據。

次日，汪與蔣公進餐後，又激動的老調重彈的要求蔣公：「使中國陷於現在情形，乃國民黨的責任，所以爾我二人，應一同辭職，以謝天下。」蔣公反駁他：「辭職以示負責，說來極爲容易；可是誰來負責救國？」

不久，梅思平到了重慶將和日本勾結簽訂密約的經過，報告汪；並說明日本希望汪脫離重慶，另組政府，談判和平。於是，汪在其寓所，召集黨羽會商多次，不能決定。但由於陳璧君的堅持快走，而日方又一再祕密催促，汪才決定出走。

出走的目的地是越南，第一個策動參加「和平」的有實力對象是雲南的龍雲。於是，由陳璧君先密赴昆明，游說龍雲。龍雲對陳表示：很同情汪氏爲國犧牲精神，如果要取道雲南出國，他願負責其安全，並給予相當便利。

於是，汪等乘蔣公一次離渝出巡的機會，由汪電話交通部長彭學沛（爲汪系人物）預留赴昆明機票；潛往昆明，與龍雲談得很投機。但龍對公開響應他「和平運動」一點，未能立即表明贊同態度。汪遂在龍派人妥爲保護下，於是年十二月廿一日抵達河內。

汪剛到河內，第二天日本政府即發表「近衛三原則」，提出「東亞新秩序」；好讓汪用爲根據，對國內發動「和平運動」。汪乃于十二月廿九日發表他響應「近衛三原則」的「艷電」。

汪出走之事，雖報上未予刊露，但市上已有傳聞。十二月廿六日，蔣公尚在 國父紀念週會報告，汪係赴河內養病，將轉赴國外；各報對汪也未攻擊；大家都希望他能迷途知返，不爲己甚；希望他勿背叛國家，自毀令名。可是當他「艷電」發表後，人人對他失望；中央爲穩固民心，堅守立場，不得不于民國廿八年元旦召開中常會，決議開除汪的國民黨籍，政府也下令通緝。

黨政雙方，雖對汪有嚴厲的處分；但仍希望他勿受敵人愚弄，鑄成大錯。曾經兩度派人赴河內多所規勸，並且送去汪等出國護照與一筆爲數可觀的旅費。

可是，汪表面上雖說擺出接受護照旅費，準備赴歐，請中央諒解的姿態；但實際上却加緊與雲南龍雲聯繫，函促龍趕快佈置，宣佈響應他的「和平運動」；同意他回到昆明，將「艷電」主張，付諸實際行動。此一密謀，被戴雨農的情報人員偵查到確證；爲了確保國家安全，伸正國法，才有誤中副車，殺死曾仲鳴之事。

汪精衛好衝動的個性，陳璧君竭力的慫恿；再加日敵的誘惑；汪等一行，終于四月廿五日，在日本特務人員的設計與掩護下，潛赴上海，步上投敵叛國的腐階。

漢奸難為，自食苦果

汪等赴上海以後，前往日本，自六月十日開始，分別訪問平沼內閣，前首相近衛，及軍部要人板垣，

米內等人，以探獲日本對今後中國新政權合作的真意；才知道日本軍部與「興亞院」的真正意旨，是使汪建立一個與「滿州國」相似的傀儡政權，一面用以分化中國抗戰陣營，一面貫徹其蠶食中國的國策；而非如汪所想像的「統一華夏」的「中央政權」。汪雖仍想親晤日皇，但被日人以日皇「不親過問外交」爲由，予以拒絕。

汪返滬以後，于七月十四日，以「中日關係的根本觀念」爲題，發表演說，批評中國抗戰爲以卵擊石；主張冤仇宜解不宜結，鼓勵同情之士，共謀和平，並作爲新政權的第一聲。

八月廿八日，汪在上海愚圓路召開國民黨的「第六次全代大會」，廢除「總裁制」，推他爲「中央執委會主席」；並且電召各地黨委赴滬報到；先從黨的方面，另起爐灶。

九月廿日，汪再在南京約見當時華北僞「聯合政府」的首領王克敏，以及南京僞「維新政府」的首領梁鴻志；會商合併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事，毫無結果。因爲三方面的真正的實際支持者，均爲日軍的特務機關：梁爲原田機關，王爲喜多機關，汪爲影佐機關；而此三機關並無直接隸屬關係。所以王、梁不能作肯定答覆，而把事實上的可否，推到日本特務機構去。事實證明，日本人的對汪估價，與王、梁相等；縱然表面上將來或許有一「中央政府」出現；但事實上南北必然仍爲各行其是，絲毫不能發生「統一」作用的局面。這與汪的權勢慾，領袖慾，以及「抱負作爲」；有了很大的差距。因此，雖說汪表面上忙「組府」，很積極；但實際上他的內心，已開始矛盾，嚐到苦果的滋味了。

十一月，日方爲了達成利用汪的真正目的；以積極支持汪「組府」爲條件，促使汪派代表在江灣六三花園，就「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舉行連續七天的會談。這一「要綱」，大藍圖爲德、義、蘇、日四國瓜分世界；蘇、日兩國瓜分中國。小藍圖則把中國的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和海南島劃分爲五種「地帶」：也可以說是五層。最深的一層是「滿洲國」，第二層是偽「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層是華北，第四層是華中，第五層是華南；而海南島和台灣一樣是日軍的基地。

當汪最初聽到「要綱」的內容時，知道上當，當即一面流淚一面憤慨的表示不能簽此「賣國契」。並且曾有遷往法租界，停止一切活動的意圖；但迅即被影佐所知，一面假裝同情汪的處境，答應回東京報告近衛，干涉此「要綱」；一面却暗中加強對汪平等的監視，使他移居的計劃，無法實現。

影佐由東京返滬，「要綱」仍然要談判；又經過將近一個月的會議，祇略作修正；最後終於民國廿八年十二月廿一日簽字。汪終於在爲他自己所形容的「賣國契」上簽了字，留下永遠無法磨滅的漢奸烙印！可是，此一「要綱」密約，却被人揭發而公諸報端，成爲轟動世界的大新聞；不但國民政府爲之發表「告全國軍民書」及「告友邦人士書」，嚴斥荒謬；即淪陷區一般民衆，對汪的真正面目，也因此而明白瞭解。起初所謂「與中央唱雙簧」的論調，也就不攻自破了。

汪的「賣國契」簽過了，日本人當然要支持他「組府」；於是在民國廿九年三月卅日，汪的偽政府成立了，原來南京的「維新政府」當然取消合併；華北的偽政權，名義上也合併到汪的政府之內；但實際上

，還是惟日軍特務機關之命是聽。汪的偽政權，仍然用中華民國的年號，居然稱為「還都」，遙奉林森爲主席，汪自封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長，軍委會委員長。（好像因他還都，在重慶的國民政府自然就不存在了，真是荒唐）仍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但加一黃色三角形飄帶，上書：「和平、反共、建國」，以示區別；並準備必要時隨便取消此帶，回復原來面目。凡此種種作爲，都表示他是繼承法統的正統，不是劉豫

、張邦昌。

其實，這一「正統」，除開國家的獨立主權不談，僅就其號令管轄所及，也偏促得很，簡直不成氣候。當時有一上海人，曾撰一聯譏嘲汪偽云：

「陳公博兼選特簡荐委，五官俱備。

汪精衛有蘇浙皖鄂粵，一省不全。」

雖說語意滑稽，但也事實如此。（陳公博以立法院長、兼軍委會政治部長



叛國降敵組織偽政府沐猴而冠的汪精衛。

、上海市長、第八區區長；上自院長而下至區長，一人兼任，亦聞所未聞。

日本所謂尊重中國主權，本來是騙人；而汪精衛向敵人所開：「可招致軍隊與黨員來歸，促進全面和平」的支票，也無法兌現。以蔣公所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為中心的抗戰陣營，並未受到汪「組府」的影響；組織仍然堅強，戰志仍然昂揚。當日軍因戰事膠着越想早日和平結束時，越對汪失望；於是逐漸對汪禮儀疏傲。自太平洋戰爭發生後，中美英蘇結成同盟陣線；在日人的眼中，汪的偽政權，反而成爲中日和平的障礙。於是時常給汪以無法忍受的侮辱。汪雖懊惱，恨敵入骨，甚至因此寢食不安；但既入牢籠，欲想再師故智，來一次負氣出走，已不可能；而且也無路可走了。

民國卅一年五月，汪承敵人之命，不得不訪問僑滿。同一傀儡的溥儀，居然擺起「帝王之尊」的架子，不以「友邦元首」之禮對待汪；使汪感到憤憤不平。民國卅二年，敵人再逼汪以「中國」名義，對英美宣戰；雖說他以此事與他「和平、建國」的宗旨不合，但又不敢不依。

漢奸難爲，自此以後，汪的舊病復發，不再有政治活動，也不再發言自欺欺人的言論了；而成爲無聲無臭的傀儡。因爲他病急亂投醫，於是又給愛國志士鋤奸正法的機會；終於使他以骨髓發炎的絕症，于民國卅二年十一月客死日本。

蓋棺論定，最大悲劇

綜觀汪精衛的一生，真是非比尋常；終身處於時代激流之中，充當要角。雖說他不遑寧處，很少有安定頤養的機會；雖說他大開大合，常常成爲風雲人物。可是，除了行刺滿清攝政王一事的表現，可以比美先烈，毫無愧色外；其餘事蹟；初則以革命志士而勾結老奸巨滑的袁世凱，後來再受俄共利用，製造黨的分裂；再「驅共倒蔣」，「聯蔣反蔣」。種種奇怪陸離的政潮，都因爲他的不甘寂寞推波助瀾而層出不窮。他也曾身居國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長的高位，領導黨國；可是，却因爲他那反覆無常的個性，從不能與任何人合作到底，甚至動輒負氣出走的事實；而未能好好把握運用，發揮一己的才華，爲黨國多所靖獻。反而使人感覺他是一個無一貫主張，無明確目標，無真正思想，無一定是非的怪角。

論才華，他有翩翩動人的風度，富有煽動性的口才，優美流暢的文筆。如果終身從事教育文化事業，他的成就，可能不在胡適等人之下；如果從事文藝寫作，他也可以成爲文壇名流；凡此，都可以使他揚名當世，甚至在歷史上留下光輝的記載。可惜他却熱中於黨政工作。

從事黨政工作，必需氣度恢宏，言行一致；國父與蔣公即因此開創事業成爲偉大人物，受人崇敬。可是汪精衛的氣度的狹窄，迥異常人；竟然以他早年同生死共患難的摯友胡漢民，作爲排擠的首一目標；難怪胡深鄙其爲人，而和他分道揚鏢了。汪的言論，的確具有吸引人的魔力，甚至有人推崇他是「民主的偶像」；可是當大家發現他言行並不一致之後，都瞭解他之所以貌恭言順，聳人聽聞；祇是一種「盜名欺世」的伎倆而已。因此，他雖然擁有一部份黨徒，但却不能得到普遍而持久的擁戴。

汪以存之於內的「私」，與形諸於外的「偽」，在黨政事業上旅進旅退，無法鞏固其領袖羣倫的地位，而其領導慾與支配慾又特別強烈，於是，惟「力」是趨。誰有力量，就結交誰，利用誰。最後，他看中了敵人的力量，想利用敵人；但却反被敵人利用，使他成爲在歷史舞台上連秦檜都不如的丑；身敗名裂，遺臭萬年。

以汪的才華資歷，不死於行刺攝政王之役，成爲革命烈士；不懸崖勒馬於逃抵河內之後，悠游歲月於海外；竟一意孤行，在敵人卵翼下，組府叛國；而成爲國人皆可殺的漢奸國賊，成爲敵人視爲鷄肋的傀儡，客死敵國。一失足成千古恨，這不但是汪精衛個人的悲劇，而且也是時代悲劇。

